

创业减贫前沿理论研究与未来方向*

□斯晓夫 严雨姗 傅颖

摘要:减少贫困既是当今世界发展目标也是学界研究热点。近10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结合创业理论对减少贫困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在这些研究中,中国过去40多年在创业减贫方面为全世界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案例和海量数据,为研究创业减贫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模式。为了深入探索与研究创业减贫问题,本文从现有权威性文献、相关性文献与大量的创业减贫实践信息着手,在梳理、区分与整合文献同时并理论联系实践的基础上,从6个方面对目前的创业减贫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与分析。由于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本文展望了创业减贫理论未来的研究方向。另外,本文还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创业减贫成功经验做了一个具有世界共享性的研讨与小结。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系统地对创业减贫理论与热点问题进行了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分析,整合出来的6个方面的创业减贫理论,包括新BOP理论(加入数字技术)、平台赋能理论、学习改变理论等进行了新的探索,注入了新的理论要素。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推动与发展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未来的研究方向,为创业减贫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创业与减贫 创业减贫理论 未来研究方向 中国创业减贫

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0.0177

一、引言

如何减少贫困是各学科研究者长期研究的重要问题。如何通过创业减少贫困是管理与其它学科研究者近10年来不断思考与实践的热点,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问题。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文献近10年来也有了一定的积累。从文献中可见,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对创业减贫的不同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从文献整合的角度来说,一些研究者侧重探索资源与减少贫困的问题,无论是资源拼凑还是寻觅资源机会都是因为缺少资源(Sutter et al., 2019)。如何在这方面提供问题导向性的解决方案?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相应的解决方案进行了理论探索(Sutter et al., 2019; Bruton et al., 2013; Si et al., 2015)。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关注地域限制、制度政策等方面的问题(Khavul et al., 2013; Kent and Dacin, 2013; Williams et al., 2017)。还有研究认为无论是减贫还是创业减贫,其中的研究主体是人,因此创业减贫的中心问题还是要从研究人出发,更具体地说要从研究贫困者出发,在研究贫困者如何改善贫困者态度行为的基础上,思考与制定相关的问题解决方案与实施方式(Ahlstrom and Wang, 2010; Woodson, 2016; Fischer, 2016; Lin and Si, 2014)。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创业减贫问题?本文从现有权威性文献、相关性文献与大量的创业减贫实践着手,在梳理、区分并整合文献与理论联系实践的基础上,从6个方面对目前的创业减贫热点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分析。另外,中国过去40多年在创业减贫方面为全世界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案例和海量数据,为研究创业减贫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模式。因此,本文对中国创业减贫

*傅颖为本文通讯作者。

的巨大成就做了一个研讨与小结,让中国的成功经验更多地与世界分享。中国曾经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但过去40多年与经济快速发展相呼应的是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过去40多年中国减少贫困人口超过8.5亿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也是率先完成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World Bank, 2019)^①。无论从世界慈善机构、世界银行还是联合国的报告中可知,中国减少贫困的实践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世界公认的。在理论研究方面,近年来中国研究者的相关论文已经发表在顶级或高水平中英文管理期刊上(杨亚非, 1998;邢小强等, 2011;邢小强等, 2019;杨婵、贺小刚, 2019;王雨磊、苏杨, 2020;燕继荣, 2020; Lin et al., 2019; Si et al., 2019; Wu et al., 2019)。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今天创业减贫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如何建立在文献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这是一个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就目前的新形势而言,无论是以理论为先导和支撑的创业减贫研究,还是以创业减贫实践为载体的创业减贫理论研究,在质量与数量两个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或思想观点。另外,由于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本文在思考与论述当前创业减贫研究的热点问题时,展望了未来的创业减贫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创业减贫权威性文献与相关问题

本文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创业减贫研究文章。为了更好地认识与研究创业减贫问题,了解相关重要文献是必要的。为此本文通过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以“Entrepreneurship”并含“Poverty”为主题词,对1950~2020年的所有在库文章进行检索^②,共有651篇,其中经管类(business economics)方向502篇,其它以环境生态科学、公共管理、地理科学为研究方向149篇。创业作为一种减贫的重要途径,651篇创业减贫文献若除以同时段以“Entrepreneurship”为主题的在库文章总计29997篇,整个创业减贫的文献仅占创业主题研究的0.02%。发表在最高水平期刊上的相应研究就更少, Si等在2019年完成的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ERD)期刊创业创新与减少贫困专题研究,列出了发表在具有最高学术影响力的管理与创业期刊的研究文献(Si et al., 2019)。

本文在中国知网以“创业”并含“贫困”作为主题词,对发表在国内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文献进行检索^③,结果显示共有57篇(如果在中国知网仅以“创业”为主题检索1998~2019年同期所发表的CSSCI论文,总数为13049篇)。最早的文献发表于1998年,即杨亚非所著的《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伟大的创业精神——从立屯消除贫困的实践看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杨亚非, 1998)。有关创业减贫国内文献的发表趋势大致表述如图1。

从图1可见:创业减贫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文献积累。近年来,中国研究者的文献也在增加并越来越具有国际共享性。这些文献从理论上支持了并且正在继续支持新的创业减贫理论发展并指导实践。这些文献主要区别在于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以及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创业减贫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探索。从文献整合的角度而言,现有创业减贫文献比较多地集中于以下3种情形。一是将贫困起因归为贫困者资源的欠缺,再以创业弥补此欠缺后获得脱离贫困的结果(Sutter et al., 2019),这种情形常常是分散式的个体贫困,很多相关的研究试图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帮助草根创业者通过创业减少贫困(Bruton, 2010; Kaplinsky, 2011; Kistruck et al., 2013; Bruton et al., 2013; London et al., 2014; Si et al., 2015);二是将贫困起源归因于受到地域限制,这个地域不仅是地理位置,还包括地域制度政策等方面的限制,相关的研究试图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Bradley et al., 2012; Khavul et al., 2013; K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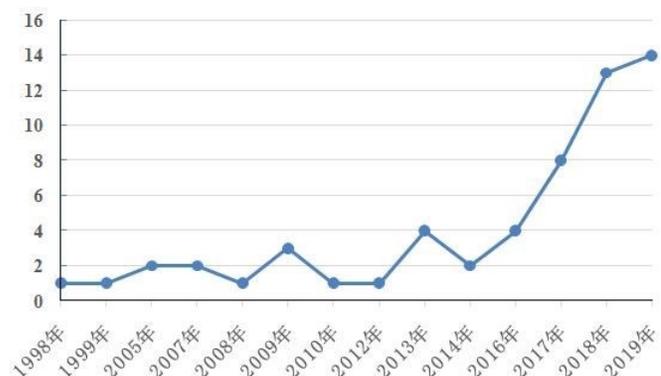


图1 我国创业减贫文献发表趋势图(1998~2019年)

and Dacin, 2013; Ault and Spicer, 2014; Sun and Im, 2015; Williams et al., 2017); 三是将贫困起源归因于贫困者素质提高与发展受到各种限制,如学习条件缺失、户籍等,都限制了贫困者本身的学习改变,进而逐步改变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相关的研究探索并提出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Vaona, 2005; Ahlstrom and Wang, 2010; Woodson, 2016; Fischer, 2016; Lin and Si, 2014)。基于上述3种情形与相关研究文献,以及创业减贫的实践成果,本文从6个方面深入探索创业减贫理论,它们分别是:(1)本土/本地创业与减贫(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2)新BOP模式(Bottom of the pyramid perspective);(3)资源补给理论(Remediation perspective);(4)平台赋能理论(Platform empowerment perspective);(5)制度变革理论(Institutional reform perspective);(6)学习改变理论(Learning and changing perspective)。上述6个方面的创业减贫研究变量与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以及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见图2。

三、创业减贫前沿理论研究

(一)新BOP模式(Bottom of the Pyramid Update)

BOP是Bottom of the Pyramid(现多改称为“Base of the Pyramid”)的缩写,一般指低价位、低收入阶层市场或穷人市场。也有人称其为草根创业模式或理论。近些年BOP理论融合了新的要素,新BOP模式与原来的BOP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加入了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等的运用,这使模式的机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回顾这些年来BOP的内容与功能,Prahalad和Hammond(2002)认为领导世界主流的跨国企业遗漏了约占世界人口总数70%的40亿穷人客户的需求,他们提出BOP减少贫困的核心理念是大型企业开发高性价比且底层消费者喜闻乐见的产品,提高BOP阶层的生活质量(减少贫困),与此同时可以实现大型企业在经济意义上的商业利益(有别于社会性质的慈善)。此外针对个体资源不足的情况,家族(家庭)的节省和稳定是重要的资源来源渠道(Kimmit et al., 2020)。BOP是一种通过贫困者减少支出,增加节余来摆脱贫困的方式(London et al., 2014)。也有研究认为BOP理念本质上来说是大型企业产品创新,找到新市场空间创业机会的公司内部创业行为(Seelos and Mair, 2007; 万倩雯等, 2019),由此促成企业通过产品或商业模式创新为贫困人口服务的目的(Bruton et al., 2013)。可见,BOP一直试图取得大型企业组织对贫困市场的重视(Hart and Christensen, 2002; Prahalad and Hammond, 2002)。目前的研究则转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探索穷人如何成为BOP模式下的活跃消费者,把产品价格策略等市场营销手段作为重点关注的领域(Christensen et al., 2015; London et al., 2014);二是鼓励政府、企业和其它创业者与贫困居民一起加入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构建底层消费者市场(Calton et al., 2013; Kistruck et al., 2013)。邢小强等(2011)研究发现,在中国由于价值链缺失与制度空洞,企业需要建立跨部门的价值网络,其中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是成败关键。数字技术有助于BOP的创业实践和包容性市场开发(邢小强等, 2019)。Si等(2015)则认为BOP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是被人们十分重视但又缺少具体解决问题方案的创业减贫模式。联系这一研究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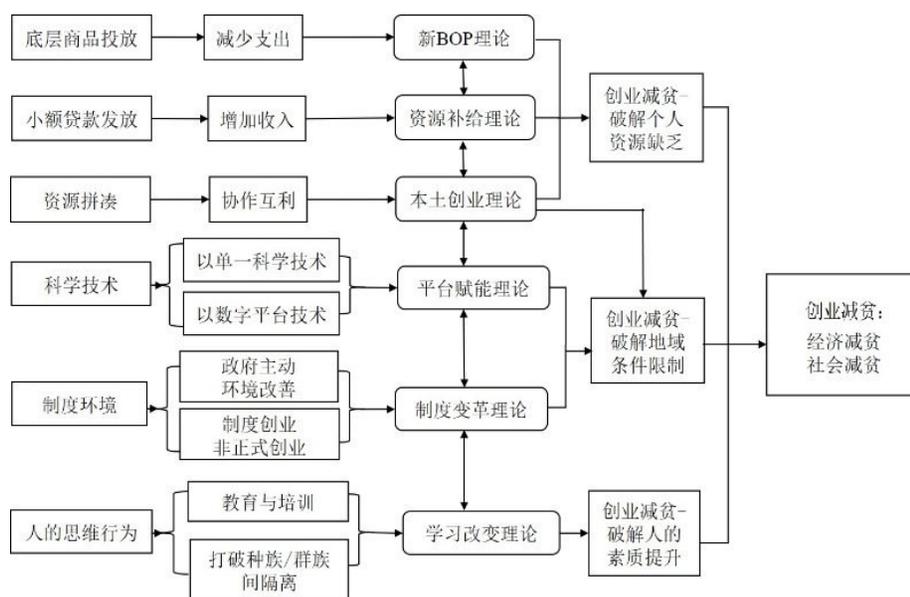


图2 创业减贫研究变量与研究框架

本文认为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减贫经验与模式不仅值得与世界分享,更可以为新BOP理论研究提供案例与数据支持。此外,由于全世界贫困人口依然众多,进一步推动与发展BOP理论,无论是对于创业减贫的理论还是实践都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二)资源补给理论(Remediation Perspective)

资源补给理论认为,当资源得到直接供给时,创业可以减少贫困(Sutter et al., 2019)。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认为贫困是由资源缺乏造成的,如缺乏金融资本或其他物质资产。因此,向有创业需求的贫困人口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其开创事业,不仅可以提高自身和家庭收入,还将对于家庭非经济绩效,包括创业者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情况产生积极影响。资源补给理论指出,创业导向资源、社会资源、知识资源、政治稳定资源和物质资产是贫困地区创业活动产生的核心要素(West III et al., 2008; Ahlin and Jiang, 2008)。西方的研究通常认为,土地、劳动力、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供给越多,贫困程度越低(Fallon and Lucas, 2002; Leff, 1979; Romer, 1986)。在此观点下,西方大量学者常将外国的直接资源援助视为是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方式(West III et al., 2008; Alvarez et al., 2015)。小额贷款是资源补给理论的一个典型实例。本文认为关于小额贷款的现有研究主要可以分为3个方面,一是主流的探索,即金融组织向有创业需求的贫困人口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其开创新事业。小额贷款有利于创业者调整创业规模,维持或增加收入(Chliova et al., 2015);二是除了增加个体收入,还对家庭其它方面有帮助,如创业者子女的受教育情况、创业者及其家庭的健康和营养,以及妇女的权利等(Hermes and Lensink, 2011; Sutter et al., 2019; Holvoet, 2004; Mair et al., 2012; Ranis et al., 2000)。现有研究发现小额贷款服务对于女性创业脱贫效果稳健,是促进家庭增加收入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Chliova et al., 2015)。此外,如果说小额贷款是给予创业者的资源补给,那么小额贷款组织(MFOs)的资源补给从何而来? Cobb等(2016)研究发现商业和公共资助者会在稳定的环境中投资不同类型的小额信贷组织,随着政治和财务不确定性的增加资助者会增加投入。Zhao和Lounsbury(2016)研究发现,市场逻辑高的国家小额信贷组织越能获得投资者资金支持;宗教差异化大的国家抑制了小额信贷组织资金的取得,而且会削弱市场与资金获得之间的关系。小额贷款助力创业减贫的机制如图3所示。

(三)本土创业与减贫(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本土创业(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理论是近些年来创业减贫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探索了本土创业与减贫的问题(Haveman, 1993; Pearce, 2005; Tobias et al., 2013; Sautet, 2013)。本土创业不同于由外部创业者帮助贫困人口的BOP模式,而是一种本地贫困居民通过自主创业来减贫的模式,它与当地文化的相同性高度相关,这种创业减贫模式在当年浙江的义乌、东阳等地很盛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很盛行。本土创业通常基于本土居民拥有的当地知识,采用自我雇佣的形式来进行创业(Dana, 2007)。“本土贫困居民”^④常常拥有当地一些独特的文化与群体规范,从世界范围来说,缺乏与经济同步发展的机会导致了当地居民的贫困(Peredo et al., 2004)。近些年来,创业减贫的成功案例层出不穷,这使很多本土贫困居民试图通过本土创业来改变本地的贫困面貌,推动本土与周围地区的发展(Peredo and McLean, 2013; Peredo et al., 2004)。基于现有的理论文献,本土创业常以社区导向和集体形式出现。基于同化模型、关联模型和权变模型,Peredo等(2004)总结了本地创业理论模型,其机制如图4所示。

本文分析认为,本土创业减贫研究目前基本上延续着图4模型。首先,并不是所有本地居民都愿意进行集体创业,这涉及到身份认同问题和当地文化问题(Hindle and Moroz, 2010; 张国庆等, 2019);其次,将大量的当地居民整合并成立社区企业(Community-Based Enterprise),在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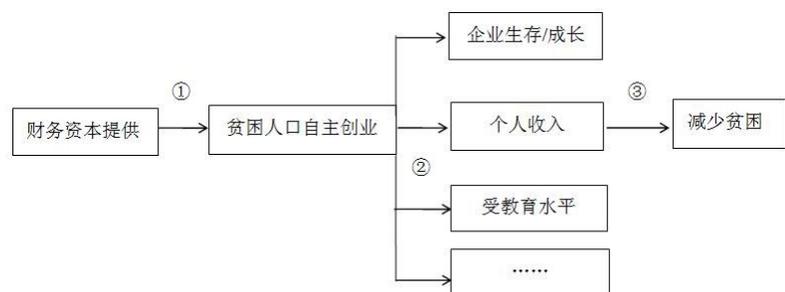


图3 小额贷款促进创业减贫的机制示意图

大程度上需要一位或几位“万事通”(jacks-of-all-trades)领导者(Lazear, 2004; Selsky and Smith, 1994)。再次,本土创业以创办集体企业或促进地区大量个体创业的形式,以达到创业减贫的目的(Praag and Versloot, 2007; Rindova et al., 2009);最后,本土创业减贫最终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支持,包括政府部门以及一些公益等其他社会组织的支持。本土创业特别是当地创业者办的集体企业,一方面可能引导当地相同形式的创业(Haveman, 1993),另一方面可能形成创业机会集的构建(Castellanza, 2020),衍生出其他类型的创业业态作为社区企业的补充(Peredo and Chrisman, 2006),如伴随当地社区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当地居民会不断开设餐馆、加油站等等(Peredo and McLean, 2013)。这种衍生创业为政府实施精准减贫/扶贫提供了依据。在中国,精准扶贫/减贫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减贫模式,并制定相应的扶贫/减贫政策,为衍生创业的创业者提供小额信贷、转移支付、教育培训等支持(卢盛峰等, 2018),发挥本地社区创业与国家地区层面精准扶贫/减贫产生联动效应。这方面的中国经验非常值得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以及在中国的创业减贫理论与实践探索两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四)平台赋能理论(Platform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平台理论结合数字技术是近年来理论探索的一个热点。科技是促进创业减贫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的创业研究,西方的研究重视具体技术,两篇发表在 Research Policy 上的文章, Fischer (2016) 和 Woodson (2016) 分别研究了绿色作物技术和纳米医学对创业减贫的作用。中国的研究则指向数字技术平台建设。这些与技术相关的创业研究,近年来都被应用于创业减贫,如研究互联网带宽、网速等情况对贫困地区创业的影响(Qiang et al., 2009),中国“淘宝村”数字技术平台与创业减贫相结合的平台赋能理论研究(He, 2019)等。平台理论由来已久,但这些年来流行的平台理论不同于原来战略管理中的概念,它是和网络连接在一起的管理模式(Mair et al., 2012)。通常平台连接两个或多个群体,以提供双方或多方的互动机制来满足所有群体的需求并从中获利,其创造价值逻辑是以“连接”再“聚合”的方式降低各个平台参与方的交易成本,促使网络效应发生作用(陈威如、余卓轩, 2013)。平台能快速打通行业上下游,改造并形成新的行业生态系统(李广乾、陶涛, 2018)。赋能(empowerment)是指个体或者组织对客观环境与条件拥有更强的控制能力来取代无力感的过程,意味着参与者共同达成目标,获取资源入口和共同理解复杂的环境(Perkins and Zimmerman, 1995)。平台赋能帮助贫困居民在平台上建立创业孵化渠道或自我雇佣创业渠道,如通过自身产品销售取得交易实现增收,实现减贫的模式(Si et al., 2015)。平台赋能与数字经济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创业减贫问题的解决方案紧密连接,电子商务平台公司为初创企业(或店铺)创建了一个生态系统,以消除自我雇佣创业者的诸多结构性瓶颈(He, 2019)。以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创业减贫可以分为创业者自发和政府发起两种模式,农民自发形成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由穷人创业”(entrepreneurship by the poor)的模式,主要是指农民自发的使用电子商务平台,将当地传统产品甚至非当地产品在线化,农民成为网商直接面对市场。一般来说,这种区域内减贫发展路径需要地方精英创业者先行,他们比较早期的接触电子商务手段,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能力,并能发现市场机会。由政府主导的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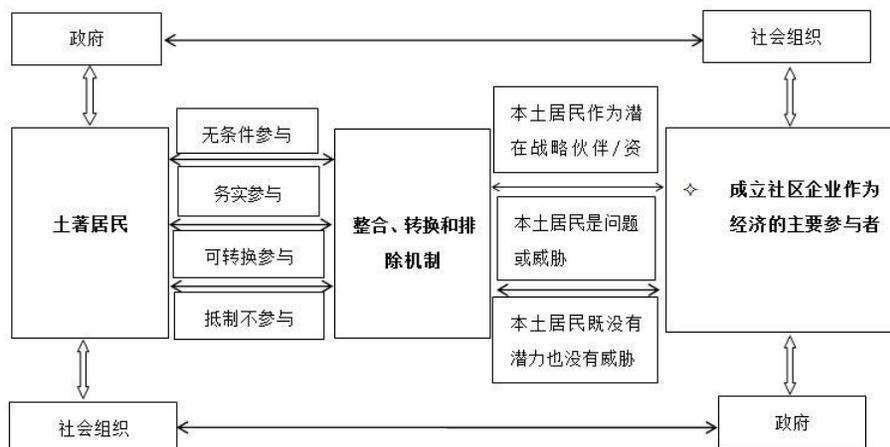


图4 本土创业减贫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 Peredo, A. M., Anderson, R. B., Galbraith, C. S. and Honig, B., 2004, "Towards a theory of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1(1-2), pp.1-20.

如“网上供销社”可以被理解为“穷人创业”(entrepreneurship to the poor)提供途径,其目的是通过建立当地产品与网络信息平台对接的平台,解决“农产品进城”的问题,从而形成自我雇佣的创业渠道。基于平台赋能的创业减贫的典型案例是“淘宝村”,它帮助农民一方面借助平台将农产品销往外地提高收入,另一方面农村淘宝为村民购买生活生产物资,为村民节省20%左右的开支,这是一种间接扶贫(颜强等,2018)。平台赋能是近年来创业减贫研究的热点,中国在这方面的淘宝村等实践与经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方面的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持。

(五)制度变革理论(Institutional Reform Perspective)

从Gnyawali和Fogel(1994)的文章开始,大量的文献强调制度环境在促进创业减贫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除了延续经济学视角从宏观制度环境改造的角度研究创业减贫(Sautet,2013),创业减贫引伸出重要的研究议题是制度创业和“非正式创业”(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后者涉及的是企业或自我雇佣的注册与监管问题(Webb et al.,2020),此创业减贫机制对应于制度变革理论的研究。国内有不少研究也是从制度环境的方向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包括政府治理方式促进农民创业(李博,2016),以多方共同建立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邵希等,2011)以及农民创业园产业化促进农民创业(黄承伟、覃志敏,2013)。如何通过制度变革实施创业减贫是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Khavul et al.,2013;Ault and Spicer,2014;Williams et al.,2017)。制度变革理论观点的核心是如果制度得到完善,那么创业将被鼓励和激发(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Tomizawa et al.,2019)。近年来,研究者发现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是制度与政府的不足(如相关政策跟不上)和一些社会问题(如妇女歧视)(Saebi et al.,2019)。制度变革理论认为,通过创业减轻贫困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增加社会平等,这意味着经济效率等经济成果不完全代表创业的成功(Sutter et al.,2019)。Goel和Karri(2020)认为贫困创业者对制度环境的主观价值判断影响着他们的创业行为。因此,政府必须改善以下与创业与减贫相关的5个方面(Gnyawali and Fogel,1994),它们分别是(1)政府的政策和流程、(2)社会经济条件、(3)创业和商业技能培训、(4)财务支持、(5)非财务支持。上述制度环境改善将通过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以及促进关键资源的提供来影响新创企业的产生,进而达到减贫的目的。Mair等(2012)研究了孟加拉农村一个包容性市场的建立过程,发现了当地一个重要中介机构在化解制度真空促进变革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包括重新定义市场和合法化参与者,从而提高创业者数量。制度环境也决定着创业的绩效,Lin等(2019)研究发现创业可以普遍促进贫困减少。本文认为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创业对减贫/扶贫的影响比农村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相比于城市正式制度薄弱,因此很多时候这些地区可以实施创业先行,倒逼制度变革。制度环境能促进创业与减贫,反过来创业成长也会引发制度环境的变化。如Williams等(2017)指出贫困地区居民为了改善生计进行了大量的非正式创业(企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注册),但如果要取得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减贫效果,政府必须改革程序手续等制度。本文也发现制度环境不仅直接影响地区贫困居民的创业,也影响着对小额贷款组织的监管。Khavul等(2013)发现在危地马拉,小额贷款先开始于地区发展减少贫困,后来当小额贷款组织达到30%的利润,这时传统银行业与小额贷款企业产生冲突,结果是小额贷款组织陷于更严厉的监管制度。此时,以减少贫困为最初缘由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可能逐渐转变为以经济目标为考量的组织,以躲避监管(Kent and Dacin,2013)。上述结果说明,创业减贫依存于不同的制度环境而有着很大差异,关注制度和创业的研究显然是有价值的,其中无法回避的是创业和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斯晓夫等,2017)。也就是说,是制度的生成引领了创业,还是创业可以先于制度?中国的创业减贫实践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在体制上做了很多调整与变革,客观上为具有创业精神的创业者提供了创业机会,由此使得如义乌、温州的农村贫困者成了创业者,导致了个体乃至地区的减贫效果(Si et al.,2015)。中国目前还有许多创业减贫实践,如乡镇的“扶贫车间”,目的都是政府“创业”帮助贫困人口就业,然而这方面的创业减贫至今尚无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

(六)学习改变理论(Learning and Changing Perspective)

创业减贫涉及资源、区域差异、制度等等,但如何改变贫困地区穷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提高穷人的个人

素质,以及破解种种穷人个体的发展限制,这些是学习改变理论研究的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研究这些问题(Vaona, 2005; Ahlstrom and Wang, 2010; Woodson, 2016; Fischer, 2016),如蒋艳(2008)研究发现激发地区贫困人口内生性创业力量的方式必须依靠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农民的知识资本对农民绩效有显著作用(张银、李燕萍, 2010)。学习改变理论假设贫困人口总体来说内生脱贫动力严重不足,甚至有小部分群体自身具有“宿命论”的价值观,认为他们就像印度种姓制度一样本该生活如此(Bénabou and Tirole, 2006),相反同样是基于印度贫民窟的研究,如果有改变意愿的贫民窟创业者,他们创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Shepherd et al., 2020)。如何让贫困者通过创业使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从消极的模式转变为积极的模式,这是提出学习改变理论的出发点与目标(Si et al., 2015)。近年来,研究者提出知识资源是创业减贫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不断学习是有效减少贫困地区贫困者的关键。一些实证研究显示,农村创业者创业绩效取得来自自我识别的机会,而非从社交网络所识别的机会或政府推动的机会(West III et al., 2008; Si et al., 2019; Wu et al., 2019)。可见,学习改变理论认为穷人的态度和创业者的积极行为与减贫有效性高相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贫困者通过学习(即使这种心态在学校里没有得到很多鼓励),可以改变对创业、试错的态度和行动,并可以在学习中获得有用的知识和认识的提高(Ashford and Tsui, 1991; Dweck, 2007; Goel and Karri, 2020),从而增加创业收入。贫困者的减少,以及思维与行为的改变又可以推动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Lin and Si, 2014; Si et al., 2015)。中国过去40年,很多人从原来的贫困者成为成功的创业家、企业家,他们的学习改变和不断试错的精神,造就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Ahlstrom et al., 2008; Ahlstrom and Wang, 2010)。学习改变与创业减贫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在亚洲、非洲和美国黑人族群的研究都得到了证实(Fairchild, 2008; McCloskey, 2010; McCloskey, 2016)。另外,学习改变理论与政府的政策张力也有关联, Fischer(2016)研究亚洲的绿色作物技术如何帮助非洲小户农民增产。他的研究结论指出,学习技术是一部分,技术是中性的,非洲当地政府对新技术的政治承诺更重要。上述研究结果说明,贫困者产生主观能动性是创业脱贫的巨大动力(Si et al., 2015),而激发贫困者的创业意向与动力需要他们的学习改变,这种学习改变可以来自自身,也可以通过政府对制度与政策的改进(Goel and Karri, 2020)。

以上是创业减贫热点问题与前沿理论研究,由于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探讨与认识理论现状与未来方向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基于权威性文献、高相关性文献,以及创业减贫实践信息,提出下面几个未来的研究方向。

四、创业减贫理论研究的未来方向

(一)权威性理论的延伸研究

何谓权威性理论?这其实是见仁见智的。现有的创业减贫文献虽然谈不上是经久不衰的经典文献,但已经具有一定权威性,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管理/创业学者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他们的研究,并将他们的创业减贫研究成果发表在具有权威性的期刊中,如Lin等(2019)、Wu等(2019)、Si等(2019)、邢小强等(2019)、杨婵和贺小刚(2019)、卢盛峰等(2018)等。这些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不仅是先前权威性理论的延伸研究,而且相比较先前的研究而言更多地联系成功创业减贫实践。很多创业减贫观点可以通过这些理论被推断出来,这些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研究价值。强调与展望权威性理论延伸研究的第一个原因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现在很多研究者每天获得大量信息和知识,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些知识信息进行深度思辨与过滤。因此,目前很多创业减贫研究是现象驱动而非理论驱动的研究。加深学习与理解权威性创业减贫理论文献,有助于研究者形成理论研究范式,并在这些范式的基础上做研究。展望权威性理论的延伸研究的第二个原因是,权威性理论同样存在它的局限性,比如过去数十年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小额贷款改善个体和家庭状况,但是Bhuiyan和Ivlevs(2019)的研究发现小额贷款会导致个体的忧虑感而减少生活满意度(在男性中更严重)。上述研究结论是对过往主流小额贷款(资源补给理论)的挑战。未来的研究需要继续探索与克服权威性理论的局限性,这是研究者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既是对过去权威性研究的延

续,也是对未来研究的一种开拓。有人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数据时代,但理论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数据与理论相比较,前者反映的是过去,后者教人如何看到未来。因此,展望未来的创业减贫理论研究,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看到未来,创业减贫理论的发展又会进一步推动创业减贫的成效。

(二)经济与社会双视角研究创业减贫

经济创业视角与社会创业视角,二者有机结合共同研究减贫问题,是创业减贫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Sutter等(2019)的研究认为,创业减贫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增加社会平等,不应该一味看经济效率等经济成果。中国过去40多年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基本上是通过经济创业减贫来实现的,但由于缺乏社会创业减贫而留下的诸多问题或不足之处依然存在,如贫困者经济脱贫后个人社会素质并没有得到同步发展,如何有效减少社会贫困者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创业减贫的研究问题。目前相关的理论研究不多,但却是非常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未来创业减贫研究中的创业应该是经济创业与社会创业两方面共同促进国家或地区的减少贫困过程。

社会创业在发达国家近年来获得了新的发展,主要是社会问题导向性研究,如减少贫困、生态环境与法治公平等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Austin et al., 2004; Zahra et al., 2009)。这些研究催生理论研究者思考创业减贫研究的新思想、新实践与新理论。Austin等(2006)认为经济创业和社会创业在很多相同之处,提出了SVP模型(Social-Value Proposition),这个模型强调社会创业中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如税收、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等)等变量之间的协调。Zahra等(2009)进一步提出社会拼凑者(social bricoleur)、社会构建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社会工程师(social engineer)的概念来解决未被满足的社会问题,这里自然包括减少贫困的问题。这些研究无疑对于深入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理论支持。另外,已有文献研究中,社会嵌入理论(social embedding perspective)等也可以为上述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如Sutter等(2013)提供了一个以往没有被认识到的社会关系,那就是贫困地区的创业者嵌入在当地半正式的非正式组织关系中,创业者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减少与非法行为者的接触,以及将业务转移到非法行为者无法找到的新地点,来避免非法组织的干扰。社会嵌入理论还发现贫困地区的创业者想要追寻创业成功,必须遵守人际交往的规范,利用良好人际关系获取点对点借款(Bruton et al., 2015),以及通过利用本地可用关系和广泛网络作为资源开发,以取得创业绩效(Wierenga, 2020; Ring et al., 2010)。综上所述,从经济创业视角与社会创业视角有机结合共同研究创业减贫理论可以丰富现有的研究文献,目前这方面已经有大量的实践与成功案例,但缺乏理论层面的系统研究。

(三)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Digital Technology and Platform)

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的出现使创业减贫产生了很多新的方式。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现在不仅应用于技术创业,而且应用于创业减贫,为创业减贫的实践提供了大量的问题解决方案。近年来,在经济层面研讨相关问题,如Qiang等(2009)研究结果显示新兴国家的宽带渗透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GDP增长将增加1.38%,又如Khanal和Mishra(2016)的研究通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测算发现,互联网的使用非常显著地提升美国农场家庭总收入。然而这些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的研究只注重技术对农民收入提升的作用与效果,而非减贫效果,其所研究的对象也不都是贫困户。在政府与研究者层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探索如何使用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减少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中国通过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途径减贫的底层逻辑是更便捷、更多选择,具有实际效果。中国数字技术与平台减贫的主要方式是电子商务平台赋能,以县域、乡域、村域为发展目标,建立了大量的“淘宝县”、“淘宝乡”、“淘宝村”。这些“建制制”的中国地域脱贫实践的成就,很大程度归功于阿里巴巴等企业利用“大数据”帮助精准扶贫。目前,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应用于创业减贫是政府、社会与企业都在实践的事情,但缺少这方面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因此,本文认为未来的数字技术/数字化平台与减贫研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一是因为管理理论的根本价值在于解决实际问题,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为减少贫困提供了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但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更多的理论研究成果?这是社会对未来理论研究的期待;二是数字技术/数字化平台与减贫现有的实践案例和海量数据为产生新的理

论提供了重大支持。另外,今年的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其中很多行业通过它们掌握的数字、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为减贫做贡献。因此,这种数字化转型一定会体现在未来的创业减贫的成果中。除了技术方面,本文同时认为,未来的研究在不仅仅局限于数字技术和减贫本身,而会更多地连接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共同体现研究的价值,这些具体的问题包括“技术向善”、“数字立法”和“美好社会建设”等。

(四)创业减贫和乡村振兴(Poverty Red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发达国家的农村是相对富裕的地方,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是普遍贫困的地方。减贫与振兴农村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以中国为例,创业减贫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乡村振兴,因为中国的贫困地区与贫困者大部分在农村(张国庆等,2019)。近年来经过各方的努力,中国的创业减贫与农村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2020年也是中国全面脱贫的目标年。这些年来中国创业减贫开始是通过很大比例的生存型创业,农民创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一点家庭收入以维持生计(Wu et al.,2020)。如果说摆脱贫困是中国创业减贫第一步,那么乡村振兴将是中国创业减贫的第二步。此时,相关的创业减贫理论研究可能会从“输血式”扶/减贫向“造血式”扶/减贫转变,并进一步激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内生动力。当脱贫人群通过学习改变获得积极的态度、行为,并结合信息技术手段获得资源补给后,他们有可能转变成为创新型创业者,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Si et al.,2015)。如江西井冈山市围绕茶叶、菌草、林果推进“创业式”扶贫;八角楼农科园带动6000余农户户均增收1万元;宁夏盐池县2016年科技投入达3705万元,科技对县域经济贡献率达到50%,这些都是创业减贫后县域经济实现进一步乡村振兴的鲜活案例。本文认为在未来创业减贫过程中,政府、社会和市场会更加有机结合,建立相应的激励相容机制,为不同主体参与乡村振兴带来可能性和可行性。从现有初步成果的乡村振兴案例来看,也无不体现出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财政在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进乡村的主导性作用,以及当地脱贫后的村民继续保有的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因此,从创业减贫到乡村振兴,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问题导向性的理论层面都意义重大。我们可以展望未来生存型创业比例将逐渐降低,发展性创业、创新性创业的比例将逐步提高。与之相应的创业减贫理论研究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从研究基于中国国情的BOP理论转向全方位的创业减贫理论研究,以破解减贫与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与限制。

五、结论

创业减贫是近10年来管理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各国也有自己的模式。近10年来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政府、慈善机构,以及大集团公司等都在努力寻找与实施各种创业减贫的问题解决方案与相关的理论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文从阐述创业减贫的理论开始,收集、梳理与整合了几十多年来创业减贫研究文献,在整合与分析这些发表在中英文高水平期刊论文的基础上,结合本文作者近些年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出了6个方面的创业减贫前沿理论。这些研究理论不是对过去理论的重复,而是在过去理论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研究内容。同时,在文献与上述6个方面理论研究,以及创业实践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对未来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方向展望,包括4个方面:权威性理论的延伸研究、经济与社会双视角研究创业减贫、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创业减贫和乡村振兴。当然,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很广,但目前又相对缺乏研究成果的前沿研究问题,很多相关问题值得聚焦深入研究。比如与本文中**BOP理论**、本土创业理论、学习改变理论等理论高度关联的“困”(plight)的研究,就是非常值得研究者现在与未来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延伸的问题。根据我们对上述六大理论的认识,以及对贫困地区与贫困者的考察与研究,我们发现贫困者一般生活在困境中,这种困境是由各种经济、社会和个人原因造成的,其中各种困难和限制阻碍了贫困者脱贫的思想与行为,因此减少贫困的关键因素是找出其中的“困”,帮助贫困者从“困”中走出来,实现个人减贫到本土减贫的目标。但过去这些年,一些研究者(Hart and Christensen,2002;Si et al.,2015)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慈善组织和政府经常呼吁减少贫困,但他们似乎回避了导致个人与社区贫困中“困”的多重因素,强调基本救济品作

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但事实证明其效果是有限的。本文作者近年来在世界不同地区测试了不同的减贫方案,发现通过分析贫困者困境中的“困”,找到相应的问题解决方案是减贫的关键。再如,社会贫穷(social poverty)、蚂蚁利润(ant profit)等问题都可以是值得深入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创业减贫问题,也是未来创业减贫理论研究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另外,本文在很多方面列举与论述了中国创业减贫的成就。本文梳理的文献与图2中的研究变量都说明创业减贫是一个多维度的前沿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创业减贫的研究与探索,除了本文上述的研究论述,一个重大的宏观层面的原因是党和国家有明确的相关顶层设计与目标。具体的执行者/实践者重视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更善于从创业减贫实践中检验理论并理论联系实际地探索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国家与研究者特别强调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问题,但这两个方面都缺乏深入而具体的理论研究,特别是针对底层逻辑问题的研究,本文上述对于“困”的理论阐述应该是研究创业减贫底层逻辑的理论探索,也是全新的创业减贫具体问题的理论探索。另外,中国创业减贫的研究与探索不盲从西方理论。如西方创业减贫理论提出制度先行与创业跟进(Alvarez et al., 2014)的顺序,但中国创业减贫研究者(Si et al., 2015)在实践中发现中国很多创业减贫需要创业先行,这种创业先行的模式有激励减贫者转变行为模式从被动到主动的功能,相关的经验也可以为相应的制度变革提供依据。本文理论研究中的很多举例与实践途径,都说明中国创业减贫的成功经验。当然,在理论研究方面,如何将中国创业减贫的成功实践提升到理论层面,发展出更多可以指导创业减贫的新理论,这是中国理论研究者的目标与使命。

(作者单位:斯晓夫、严雨珊,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傅颖,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注释

①参见世界银行报告:<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39451555093213522/pdf/E-Commerce-Participation-and-Household-Income-Growth-in-Taobao-Villages.pdf>

②检索时间为2019年9月28日。

③检索时间为2019年10月22日,本文也尝试以“创业”并含“贫穷”作为检索关键词,CSSCI的文献数量为3篇,结果都已包含在之前的检索结果中。

④他们可能已经不住在原先祖先的所在地,但其本地居民的身份还存在(Peredo et al., 2004)。

参考文献

- (1)陈威如、余卓轩:《平台战略:正在席卷全球的商业模式革命》,中信出版社,2013年。
- (2)黄承伟、覃志敏:《贫困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与产业化扶贫机制创新——基于重庆市农民创业园产业化扶贫案例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5期。
- (3)蒋艳:《贫困地区民营经济内源性力量培育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 (4)李博:《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
- (5)李广乾、陶涛:《电子商务平台生态化与平台治理政策》,《管理世界》,2018年第6期。
- (6)卢盛峰、陈思霞、时良彦:《走向收入平衡增长:中国转移支付系统“精准扶贫”了吗?》,《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 (7)邵希、邢小强、仝允桓:《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6期。
- (8)斯晓夫、钟筱彤、罗慧颖、陈卉:《如何通过创业来减少贫穷: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与发展管理》,2017年第6期。
- (9)万倩雯、卫田、刘杰:《弥合社会资本鸿沟:构建企业社会创业家与金字塔底层个体间的合作关系——基于LZ农村电商项目的单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9年第5期。
- (10)王雨磊、苏杨:《中国的脱贫奇迹何以造就?——中国扶贫的精准行政模式及其国家治理体制基础》,《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 (11)邢小强、仝允桓、陈晓鹏:《金字塔底层市场的商业模式:一个多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10期。
- (12)邢小强、周平录、张竹、汤新慧:《数字技术、BOP商业模式创新与包容性市场构建》,《管理世界》,2019年第12期。
- (13)颜强、王国丽、陈加友:《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的路径与对策——以贵州贫困农村为例》,《农村经济》,2018年第2期。
- (14)燕继荣:《反贫困与国家治理——中国“脱贫攻坚”的创新意义》,《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 (15)杨婵、贺小刚:《村长权威与村落发展——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管理世界》,2019年第4期。
- (16)杨亚非:《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伟大的创业精神——从立屯消除贫困的实践看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学术论坛》,1998年第1期。
- (17)张国庆、斯晓夫、刘龙青:《农民创业的驱动要素:基于扎根理论与编码方法的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3期。
- (18)张银、李燕萍:《农民人力资本、农民学习及其绩效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0年第2期。
- (19)Acemoglu D. and Robinson J. A.,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ooks.
- (20)Ahlin C. and Jiang N., 2008, “Can Micro-credit Bring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6(1), pp.1~21.
- (21)Ahlstrom D. and Wang L. C., 2010, *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 in East Asia: How History Matter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 (22)Ahlstrom D., Bruton G. D. and Yeh K. S., 2008, “Private Firms in China: Building Legitimacy in An Emerging Economy”, *Jour-*

nal of World Business, 4(43), pp.385~399.

(23) Alvarez, S. A., Barney, J. B. and Newman, A. M. B., 2015, "The Poverty Problem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Solutio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2(1), pp.23~37.

(24) Alvarez, S. A., Barney, J. B., McBride, R. and Wuebker, R., 2014, "Realism in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9(2), pp.227~231.

(25) Ashford, S. J. and Tsui, A. S., 1991, "Self-regulation for Managerial Effectiveness: The Role of Active Feedback See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4(2), pp.251~280.

(26) Ault, J. K. and Spicer, A., 2014,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Poverty: State Fragility as a Predictor of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Commercial Microfinance Lending", *Southern Medical Journal*, 35(12), pp.1818~1838.

(27) Austin, J. E., Stevenson, H. and Wei-Skillern, J., 2006,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Same, Different, or Bot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0(1), pp.1~22.

(28) Austin, J., Leonard, H., Reficco, E. and Wei-Skillern, J., 2004, "Corporat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New Vision of CS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No. 05-021.

(29) Bénabou, R. and Tirole, J., 2006,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2), pp.699~746.

(30) Bhuiyan, M. F., and Ivlevs, A., 2019, "Micro-Entrepreneurship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Rural Banglades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4(4), pp. 625~645.

(31) Bradley, S. W., McMullen, J. S., Artz, K. and Simiyu, E. M., 2012, "Capital Is Not Enough: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9(4), pp.684~717.

(32) Bruton, G. D., 2010, "Letter from the Editor: Business and the World's Poorest Billion—The Need for an Expanded Examination by Management Schola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4(3), pp.6~10.

(33) Bruton, G. D., Ketchen D. J. and Ireland R. D., 2013, "Entrepreneurship as a Solution to Povert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6), pp.683~689.

(34) Bruton, G. D., Khavul, S., Siegel D. and Wright M., 2015, "New Financial Alternatives in Seeding Entrepreneurship: Microfinance, Crowdfunding, and Peer-to-peer Innova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9(1), pp.9~26.

(35) Calton, J. M., Werhane, P. H., Hartman, L. P. and Bevan D., 2013, "Building Partnerships to Create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at the Base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Pyramid",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7(4), pp.721~733.

(36) Castellanza, L., 2020, "Discipline, Abje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A Constitu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in press, <https://doi.org/10.1016/j.jbusvent.2020.106032>

(37) Chliova, M., Brinckmann, J. and Rosenbusch, N., 2015, "Is Microcredit a Blessing for the Poor? A Meta-analysis Examining Development Outcomes and Contextu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0(3), pp.467~487.

(38) Christensen, L., Siemsen, E., Balasubramanian, S., 2015, "Consumer Behavior Change at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For-profi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6(2), pp.307~317.

(39) Cobb, J. A., Wry, T. and Zhao E. Y., 2016, "Funding Financial Inclusion: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Contextual Contingency of Funding for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9(6), pp.2103~2131.

(40) Dana, L., 2007,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41) Dweck, C. S., 2007, *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42) Fairchild, G. B., 2008, "The Influence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Its Correlates on Ethnic Enterprise in Urban Area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3(5), pp.513~527.

(43) Fallon, P. R. and Lucas, R. E. B., 2002,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es on Labor Markets, Household Incomes, and Poverty: A Review of Evidenc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7(1), pp. 21~45.

(44) Fischer, K., 2016, "Why New Crop Technology is Not Scale-neutral—A Critique of the Expectations for a Crop-based African Green Revolution", *Research Policy*, 45(6), pp.1185~1194.

(45) Gnyawali, D. R. and Fogel, D. S., 1994, "Environments for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Key Dimensions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8(4), pp.43~62.

(46) Goel, S. and Karri, R., 2020, "Entrepreneurial Aspirations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Context",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32(1~2), pp.91~111.

(47) Hart, S. L. and Christensen, C. M., 2002, "The Great Leap: Driving Innovation from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44(1), pp.51~56.

(48) Haveman, H. A., 1993, "Follow the Leader: Mimetic Isomorphism and Entry into New Marke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8(4), pp.593~627.

(49) He X., 2019,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Solution to Rural Poverty: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24(1), pp.1~32.

(50) Hermes, N. and Lensink, R., 2011, "Microfinance: Its Impact, Outreach, and Sustainability", *World Development*, 39(6), pp.875~881.

(51) Hindle, K. and Moroz, P., 2010,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as a Research Field: Developing a Definitional Framework from

the Emerging Canon”,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6(4), pp.357~385.

(52) Holvoet, N., 2004, “Impact of Microfinance Programs on Children’s Education: Do the Gender of the Borrower and the Delivery Model Matter?”, *Journal of Microfinance/Esr Review*, 6(2), pp.27~50.

(53) Kaplinsky, R., 2011, “Schumacher Meets Schumpeter: Appropriate Technology below the Radar”, *Research Policy*, 40(2), pp.193~203.

(54) Kent, D. and Dacin, M. T., 2013, “Bankers at the Gate: Microfinance and the High Cost of Borrowed Logic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6), pp.759~773.

(55) Khanal, A. R. and Mishra A. K., 2016,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Small Farm Business Households: the Role of Internet”,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8(4), pp.553~571.

(56) Khavul, S., Chavez, H. and Bruton, G. D., 2013, “When Institutional Change Outruns the Change Agent: The Contested Terrain of Entrepreneurial Microfinance for those In Povert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1), pp.30~50.

(57) Kimmitt, J., Muñoz, P. and Newbery, R., 2020, “Poverty and the Varieti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Pursuit of Prosperit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in press, <https://doi.org/10.1016/j.jbusvent.2019.05.003>

(58) Kistruck, G. M., Sutter, C. J., Lount, Jr R. B. and Smith, B. R., 2013, “Mitigating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in Base-of-the-pyramid Markets: An Identity Spillover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6(3), pp.659~682.

(59) Lazear, E. P., 2004, “Balanced Skills and Entrepreneu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2), pp.208~211.

(60) Leff, N. H., 1979,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Revisite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7(1), pp.46~64.

(61) Lin, S. and Si, S., 2014, “Factors Affecting Peasant Entrepreneurs’ Inten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10(4), pp.803~825.

(62) Lin, S., Winkler, C., Wang, S. and Chen, H., 2019, “Regional Determina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32(1~2), pp.41~62.

(63) London, T., Esper, H., Grogan-Kaylor A. and Kistruck, G. M., 2014, “Connecting Poverty to Purchase in Informal Market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8(1), pp.37~55.

(64) Mair, J., Marti, I. and Ventresca, M. J., 2012, “Building Inclusive Markets in Rural Bangladesh: How Intermediaries Work Institutional Void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5(4), pp.819~850.

(65) McCloskey, D. N., 2010, *Bourgeois Dignity: 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6) McCloskey, D., 2016, *Bourgeois Equality: How Ideas, Not Capital or Institutions, Enriched the Worl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7) Pearce, J. L., 2005, “Organizational Scholarship and the Eradication of Global Pover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6), pp.970~972.

(68) Peredo, A. M. and Chrisman, J. J., 2006, “Toward a Theory of Community-based Enterpris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1(2), pp.309~328.

(69) Peredo, A. M. and McLean, M., 2013, “Indigenous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Captivity of Entrepreneurship”, *Business & Society*, 52(4), pp.592~620.

(70) Peredo, A. M., Anderson, R. B., Galbraith, C., Honig, B. and Dana, L., 2004, “Toward a Theory of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 Small Business*, 1(2), pp.1~20.

(71) Perkins, D. D. and Zimmerman, M. A., 1995, “Empower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3(5), pp.569~579.

(72) Praag, C. M. V. and Versloot, P. H., 2007, “What is the Value of Entrepreneurship?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9(4), pp.351~382.

(73) Prahalad, C. K. and Hammond, A., 2002, “Serving the World’s Poor, Profitabl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0(9), pp.48~59.

(74) Qiang, C. Z., Rossotto, C. M. and Kimura, K., 2009, “Economic Impacts of Broadb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2009: Extending Reach and Increasing Impact*, 3, pp.35~50.

(75) Ranis, G., Stewart, F. and Ramirez, A., 2000,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28(2), pp.197~219.

(76) Rindova, V., Barry, D. and Ketchen, D. J., 2009, “Entrepreneurship as Emancip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4(3), pp.477~491.

(77) Ring, J. K., Peredo, A. M. and Chrisman, J. J., 2010,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4(1), pp.171~195.

(78) 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 pp.1002~1037.

(79) Saebi, T., Foss, N. J. and Linder, S., 2019,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mis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45(1), pp.70~95.

(80) Sautet, F., 2013, “Local and Systemic Entrepreneurship: Solving the Puzzl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7(2), pp.387~402.

(81) Seelos, C. and Mair, J., 2007, “Profitable Business Models and Market Cr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eep Poverty: A Strategic

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1(4), pp.49~63.

(82) Selsky, J. W. and Smith, A. E., 1994, “Community Entrepreneurship: A Framework for Social Change Leadership”,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5(3~4), pp.277~296.

(83) Shepherd, D. A., Parida, V. and Wincent, J., 2020,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for Slum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https://doi.org/10.1177/1042258719900774>.

(84) Si, S., Ahlstrom, D., Wei, J. and Cullen, J., 2019,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oward Poverty Reduction”,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32(1~2), pp.1~20.

(85) Si, S., Yu, X., Wu, A., Chen, S., and Su, Y., 2015,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Case Study of Yiwu,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2(1), pp.119~143.

(86) Sun, S. L. and Im, J., 2015, “Cutting Microfinance Interest Rates: An Opportunity Co-creation Perspec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9(1), pp.101~128.

(87) Sutter, C. J., Webb, J. W., Kistruck, G. M. and Bailey, A. V., 2013, “Entrepreneurs’ Responses to Semi-formal Illegitimat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6), pp.743~758.

(88) Sutter, C.J., Bruton, G. D., and Chen, J., 2019, “Entrepreneurship as a Solution to Extreme Poverty: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4(1), pp.197~214.

(89) Tobias, J. M., Mair, J. and Barbosa-Leiker, C., 2013, “Toward a Theory of Transformative Entrepreneurship: Poverty Reduc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Rwanda’s Entrepreneurial Coffee Sector”,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6), pp.728~742.

(90) Tomizawa, A., Zhao, L., Bassellier, G. and Ahlstrom, D., 2019, “Economic Growth, Innov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Great Enrichment”,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pp.1~25.

(91) Vaona, A., 2005,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Employ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Palgrave Macmillan”, *Research Policy*, 34(6), pp.977~978.

(92) Webb, J. W., Khoury, T. A. and Hitt, M. A., 2020, “The Influenc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Voids on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4(3), pp.504~526.

(93) West, III G. P., Bamford, C. E. and Marsden, J. W., 2008, “Contrasting Entrepreneu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Latin American Economies: Applic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Resource-based Theory”,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2(1), pp.15~36.

(94) Wierenga, M., 2020, “Uncovering the Scaling of Innovations Developed by Grassroots Entrepreneurs in Low-Income Settings”,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32(1~2), pp.63~90.

(95) Williams, C. C., Martinez-Perez, A. and Kadir, A. M., 2017,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Impacts of Starting up Unregistered on Firm Performanc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1(5), pp.773~799.

(96) Woodson, T. S., 2016,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A Look at Nanomedicine for Diseases of Poverty”, *Research Policy*, 45(7), pp.1410~1418.

(97) World Bank, 2019, *The World Bank Annual Report 2019: Ending Poverty, Investing in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98) Wu, A., Song, D. and Yang, Y., 2019, “U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Entrepreneurial Effort and Regional Poverty Level”,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32, pp.112~133.

(99) Wu, J., Si, S. and Yan, H., 2020, “Reducing Poverty through the Shared Economy: Creating Inclusive Entrepreneurship around Institutional Voids in China”,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https://doi.org/10.1057/s41291-020-00113-3>.

(100) Zahra, S. A., Gedajlovic, E., Neubaum, D. O. and Shulman, J. M., 2009, “A Typolog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Motives, Search Processes and Ethical Challeng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4(5), pp.519~532.

(101) Zhao, E. Y. and Lounsbury, M., 2016, “An Institutional Logics Approach to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Market Logic, Religious Diversity,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by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1(6), pp.643~662.

Research and Future Direction on the Fronti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Si Xiaofu^a, Yan Yushan^a and Fu Ying^b

(a.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Summary: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ow to reduce global poverty through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is a critical issue for many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 in the world. In general, The large number of the severely poor people has increasingly been recognized as an issue for both governments and for businesses throughout world. For governments the presence of large numbers of the severely poor whose lives do not seem to be able to improve despite economic growth offers a potential challenge to the needed political stability. However, businesses increasingly also see the large number of people in severe poverty are not only an issue for social concern, but also as a potentially large untapped market of consumer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is a new approach for scholars to explore poverty reduction issues in recent years. Looking around the world over the years,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moved out of poverty through this approach. Scholars conduct research on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this approach and relevant researches cover many topics and perspectives. The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p journals. Obviously, how to reduce poverty that is not only the world's development goal but also the academic research hotspot. Particularly in the recent 10 year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have combined the existing entrepreneurship theories to conduc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se studies, China'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has provided researchers around the world with large number of practical cases and massive data, providing brand new research model for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and study the issu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existing authoritative literatur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plenty of practical informa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On the basis combing, distinguishing and integrating literature and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critical issue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from six aspects. In terms of the fact tha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overty reduc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s a dynamic process, this paper further anticipates the future research with new value added to the theory of poverty reduc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and summariz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hina's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was to systematically on entrepreneurial poverty reduction theory and critical issue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nalysis and integrated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six aspects, including new BOP perspective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remediation perspective,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platform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institutional reform perspective, learning and change perspective, has carried out new exploration and injected new theoretical element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paper provided new ideas for promoting and develop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overty reduction by entrepreneurship,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s for the practice of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In addition to above, this research paper ha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poverty research of where poverty reduc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now stands and, in turn, allows us to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where the research needs to move in the future as we develop an agenda for future poverty reduction research.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entrepreneurship poverty reduction theory; future studies;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JEL Classification: M13